

以攻制攻

(徐达)

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达、常遇春奉命率军北上攻击元军。徐达等根据朱元璋的战略意图，精心运筹，挥师挺进，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占了山东、河南的大片地区，并西克潼关，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接着，水陆并进，直趋元都。明军渡过黄河后，日夜兼程，向北进攻。是年八月，在河西务（今河北武清北）大败元军，随后便攻克通州（今北京通县）。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木儿），见大势已去，无力抵御，便慌忙带领一部人马和后妃、太子等逃出京城，奔往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徐达等顺利地攻占了元大都（今北京市），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至此而亡。

太祖朱元璋得到捷报后，遂下诏改元大都为北平府，指派都督孙兴祖驻守北平，命徐达、常遇春等继续向西进军。是年九月，常遇春取保定、真定（今河北正

定)。十月，冯宗异、汤和由河南渡河北进，攻占武陟等地，进入山西，又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潞州（今山西长治市）。这时，元太原守将扩廓帖木儿（又称王保保），在大败汤和军后，又率军出雁门关，经保安（今河北涿鹿），企图入至居庸关，进袭北平。扩廓帖木儿在多路元军节节败退，京城失守，偏居一隅的困境下，尚能大败汤和，并向北平进军，这就不能不使徐达等是在进军山西，还是据守北平的问题上，做出慎重抉择。徐达在认真分析了敌情之后，果断地对部属们说：“扩廓远出，太原必然空虚。北平有孙都督防守，可保万全，不必多虑。当今应当以攻制攻，直捣太原，使敌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此乃批亢捣虚之策。如果扩廓回师太原，我正好以逸待劳，一战而胜。”众将都赞成这种分析和认识，遂挥师大进，继续向太原进军。

扩廓帖木儿进至保安，获悉明军直趋太原的消息，只好回师救援。途中遭到明军的阻截，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时，常遇春向徐达建议说：“我军只是骑兵到此，步兵尚未跟上，如果立即正面交战，彼众我寡，必然造成很大伤亡。不如乘夜袭击元军营寨，打他个措手不及。”徐达深以为是。当他们正调兵遣将，准备实施夜袭时，突然有人报告：“扩廓部将豁鼻马派人前来约降，并愿作内应。”徐达等随即派人去同豁鼻马取得联系，同时命令一部轻骑，乘夜衔枚疾进，袭击元军。天近二更，扩廓帖木儿正独坐军帐，考虑如何摆脱明军阻击，回师太原的问题，忽然帐外人喊马嘶，杀声震耳。

他向外一看，只见军营中火光冲天，一派混乱，大队明军已冲入营寨。他一时失去了主意，不知如何处置为妥，仓促间，他赤着脚跳上一匹瘦马，带着十八名亲随人员落荒而逃。豁鼻马在扩廓奔逃后，率其所部四万多人马向明军投降。徐达等乘胜追击，兵临太原城下，元守军弃城而逃，太原遂为明军攻占。

【点评】在向太原进军的作战中，徐达从当时的战争全局出发，不为元军的来犯所左右，采取以攻制攻之术，变被动为主动，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徐达的这种驾驭战争的艺术，与孙臆的“围魏救赵”有异曲同工之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以攻制攻的运用，需要人们从全局出发，科学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丘福之败

（丘福）

明成祖（朱棣）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逃居塞北的鞑靼主本雅失里，杀害了明使郭骥。成祖以此为由，下令北部边将和兀哈良三卫加强边防守卫，同时从山西、山东，辽东等卫所抽调大批步骑，进驻兴和、北京，待命北征。七月三日，命洪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军，同安侯火真为右副将军，靖安侯王忠为左参将，安平侯李远为右参将，率“精骑十万”，出塞北征。

大军出发前，明成祖朱棣虑丘福轻敌，特意告诫说，兵事须慎重，自开平（其地在今内蒙古多伦地区）以北虽不见敌，应时时如临敌，“日夜严谨瞭备，敌至则出奇兵以击之”。并要求丘福“毋失机，毋轻犯，毋为所给（欺骗）。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待丘福率师北进之后，朱棣又连下诏令，反复申戒丘福要慎重战事，不可轻信“军中有言轻敌易取者”。就是说，不能

轻信那些关于敌军容易打败的言论。

八月，丘福等率军经开平出塞。他自己亲率千余骑先行，当进至胘胸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一带，与元军的游兵遭遇。丘福挥师迎战，将其击败，遂乘胜渡河，又俘获了鞑靼尚书一名。丘福向其询问鞑靼主本雅失里的去向，因为这位尚书本为鞑靼人派出侦察明军情况的间谍，便编造说，本雅失里闻大军南来，便惶恐北遁，现距此不过三十里。丘福听了便信以为真，遂决定率先头部队“疾驰擒之”。诸将都不同意丘福的这一决定，建议“俟诸军集，侦虚实而后进”。但是，丘福却坚持己见，拒不采纳此策。他以元尚书为向导，率部直袭敌营，连战两日，鞑靼军每战总是佯北而走。这就更加助长了丘福的轻敌思想。丘福一心想要生擒本雅失里，遂孤军猛追。这时，右参将李远提醒说：“将军轻信谍者，径渡河悬孤军至此，虏故示弱给我深入，进必不利。”并分析当时的情况提出“今退则为虏所乘，莫若结营自固。昼则扬旗伐鼓，特出奇兵与挑战；夜则多燃炬鸣炮，以张军势，使虏莫测。二日内，我军必至，并力攻之必利，不然也可全师而还。然尤防虏设伏，要（邀击）我归路。”左副将军王聪也力劝丘福不可轻敌冒进。李远等人的分析和认识，不仅揭示了鞑靼军诱敌深入的企图，而且提出了或战或守之具体措施。但是，丘福却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并下令说：“不从命者斩！”遂即率骑先驰，诸将也不得不率部跟进。不久，鞑靼大军突至，将丘福所率先头部队重重包围。王聪率五百

突围时战死，丘福与火真、王忠、李远皆被俘而死。在丘福所部被鞑靼军围歼之后，明后续部队皆不战而“驰还”。

【点评】胘胸河之战，丘福以十万装备精良的骑兵，进攻穷蹙于克鲁伦河一带的本雅失里残部，竟至于前锋被歼，后续部队未战而逃。明军这次失败的原因，完全是丘福的急功近利，主观武断，刚愎自用，不听劝阻造成的。丘福之败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潜心体味，一定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因 敌 作 势

（朱棣）

明成祖朱棣于丘福北征失败后，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的十五年里，先后五次率大军亲征，在军事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也表现了这位封建皇帝的军事才能，值得我们加以研究和总结。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明成祖朱棣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充分准备之后，决意率军亲征鞑靼。他于二月一日下诏，命其长子朱瞻基留守北京，户部尚书夏原吉辅政，并令翰林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随行。二月四日下出征诏书，在分析明军必胜之道时指出有五条理由，即“大击小，顺取逆，治攻乱，逸待劳，悦吊怨”。他的具体部署是：以静远侯王友督中军，安远侯柳升为副；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以上合称五军营。以都督刘江等为游击将军率前锋，以都督

薛禄、冀节等为骠骑将军，都指挥侯镛、陈智等为神机将军，都督金玉等为鹰扬将军，都指挥李文等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跟进，随时策应五军营作战，总兵力号称五十万人。

二月十日，明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向北开进，于二十五日进至兴和。此时，本雅失里闻明大军北进，非常恐慌，想与其知院阿鲁台一起向西转移，阿鲁台不从，鞑靼内部遂发生分裂，本雅失里率众西走，阿鲁台则率所部东去，以远避明军。

明军在兴和经过短暂休整后，继续北进，于五月十三日，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南岸，将本雅失里追及。本雅失里率部抵抗，朱棣登山布阵，挥军奋击，“一呼而败之”。本雅失里“仓皇穷迫”，丢弃辎重畜产，仅以七骑渡河北逃。明军俘获鞑靼贵族把秃帖木儿等男女百余人。朱棣命将所俘人口全部释放，并资给粮食、牲畜等，同时又命王友等招降余众，给予安抚。

在取得对本雅失里的作战胜利后，朱棣决定立即移兵东攻阿鲁台。五月二十日，朱棣命令以骑兵沿胪胸河东进，经阔滦海（今黑龙江的呼伦湖）向北，于十月八日进抵斡难河东北方向的飞云壑，侦知“阿鲁台聚众前山谷中”。朱棣就率数十骑登高观察后，即挥军过山，“结阵而行，左右相距数十里”，向阿鲁台部进逼。阿鲁台面对明军的进攻，曾有求降之意。朱棣恐其有诈，便令诸将严阵以待。后阿鲁台因部众主战、主和意见不一

而犹豫不决，朱棣鉴于此情，当机立断，即挥师大进，直冲鞑靼营阵，杀伤甚众，大败其军，阿鲁台携家眷仓皇向北逃走，明军乘胜追击百余里，因时值炎夏季节，明军缺粮、缺水，将士多病，朱棣便下命令全军停止追击，凯旋而归。

【点评】这次斡难河之战，是朱棣的第一次北征。他在用兵上注意“因敌作势”，首先集中兵力进击西走的本雅失里，尔后转兵东向，击败阿鲁台，收到了各个击破的积极效果。朱棣的这个“因敌作势”，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理，值得我们潜心体会。

分 则 易 制

(朱棣)

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四年（公元 1416 年）三月，鞑靼部首领阿鲁台乘瓦剌部（首领马哈木）于永乐十二年（公元 1414 年）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温都尔罕地区）败于明军之际，率兵击败瓦剌，鞑靼部力量日渐强盛，并逐步控制了游牧于今我国内蒙古朵颜山一带的兀良哈部。鞑靼部力量转强之后，又开始同明朝对抗，不仅经常谩侮、拘留明朝使臣，还不断地南进，袭扰明朝边塞重镇。对此，明成祖一面增加兴和、开平、大同等地的守备力量，一面转而拉拢和扶植瓦剌势力以对付鞑靼。

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2 年）三月十八日，阿鲁台率鞑靼军攻陷兴和，杀死明守将、都指挥使王焕。三月二十日，明成祖命皇太子监政，自己亲率大军北征，企图长驱漠北，直捣鞑靼腹心。当明军进至鸡鸣山（今河北怀来西北）一带时，阿鲁台闻讯，乘夜撤离兴和而北

遁。当时，诸将建议立即派兵追击，但成祖帝认为，追之徒劳，待草青马肥，经开平，逾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出其不意，直抵阿鲁台腹地，破之未晚。他没有采纳诸将的建议。四月十五日，明军进击龙门（今河北宣化东北），缴获鞑靼兵仓皇逃遁时丢下的战马两千余匹。六月七日，明军进至应昌。成祖帝鉴于应昌以北“地益平旷”，命诸军“结方阵而进，神机、马队必须序列整肃，不得搀错”，行军队形前后左右要严密警戒，以防阿鲁台军的袭击。

这时，明军获悉鞑靼兵进袭万全，诸将纷纷提出分兵还击，以解万全之危，但成祖帝却认为，阿鲁台此举是诈，意在牵制明军北进，并非真正要攻占万全城。所以，他决定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北进。后来，情况果如成祖帝所料，不久，进攻万全城的鞑靼兵果然撤围而去。七月四日，当明军前锋朱荣所部进至阔滦海（今黑龙江的呼伦湖）北侧时，阿鲁台已尽弃辎重、牲畜，携其眷属向北远走避战。成祖帝见寻战不成，遂派兵掠其牲畜，毁其辎重而还。

此次北征，明成祖注意吸取前人在漠北地区作战的经验教训，稳步发展，不作冒险侥倖的尝试。在回师途中，以步骑兵二万，分五路进击兀良哈部，在屈裂儿河谷，将兀良哈部打得大败，纷纷请降，达到了剪除阿鲁台羽翼的作战目的。

【点评】明成祖基于对鞑靼、瓦剌“分则易制，

则难图”的认识，采取了以政治拉拢与军事打击交替运用的策略，使其在互相抗衡、互相争战中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这种利用矛盾，扶弱抑强，分而治之的做法，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某些暂时的胜利，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边患”问题。他一生曾经五次亲自率军出塞作战，给鞑靼和瓦剌以重创，迫使他们同明朝保持臣属关系，减少了袭扰，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应当说，这在历史上还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明成祖朱棣的“分则易制”的战略指导思想，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分 进 合 击

(张 经)

明（世宗朱厚熹）嘉靖三十三年（公元 1554 年），十月，明朝廷改任总督大臣、督理东南各省军务的张经为右都御使兼兵部侍郎，专负御倭总责。

倭者，倭寇也。主要是指入侵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也包括被其利用和与之勾结的中国境内的窝主、海寇、奸商和流民。早在我国元朝末年，日本内部分裂为南朝和北朝。南朝和北朝经过了五十余年的战乱，直到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 1392 年），南朝才被北朝消灭。在长期的战乱中，许多溃兵、败将、武士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流亡到海岛上。他们与冒险的商人相勾结，不断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进行侵扰和掠夺。自明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公元 1554—1556 年），富饶的浙江沿海一带几乎月月受到倭寇的侵扰，半壁河山，几无宁土，倭患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这一时期的倭寇其主体则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

九的假倭，即伪装成倭寇的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及漳、潮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因此，这次倭寇运动，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

张经受任之后，经过侦察，发现当时倭寇的大本营在柘林（今上海奉贤以南）的川沙洼，约有二万余人。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四月二十六日，张经判断，倭寇将窜奔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遂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歼倭于嘉兴与平望一带。

对此次作战，张经作了如下部署：

命卢镗率军迫敌进入王江泾一带水网地域，防止倭寇向杭州方向窜犯，并实施尾追。

汤克宽率水师由乍浦（今浙江平湖东南）沿内河向嘉兴以北寻求倭寇作战。

张经自己则与俞大猷驰赴苏州，调兵南下平望（今江苏吴江南）进行阻击。

卢镗受领任务后，即率部进至石塘湾（今浙江桐乡西），并在道路两侧设伏。当倭寇进入伏击地域后，便立即发起攻击，歼其一部。卢镗继续按预定计划将倭寇向嘉兴以北压迫，并尾追不舍。二十七日，汤克宽率水师经内河向王江泾方向前进；二十九日，张经、俞大猷率军在平望重创企图北犯的倭寇，迫其向王江泾方向回窜。

五月一日，当倭寇窜回王江泾地区时，卢镗所部截击于前，俞大猷部追击于后，汤克宽水师进击于中。战斗打响后，乌程各县的民兵也赶赴战场杀敌，从而形成

了多路进攻、四面合击的有利态势。此战歼倭一千九百余名，焚、溺死者不计其数，残余倭寇三百余人逃回柘林。

【点评】王江泾之战，是嘉靖时抗倭战争中的一次大捷。指挥这次作战的张经，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其他成就似乎鲜为人知，当然也算不到什么兵家名将。但是，他所指挥的这次王江泾之战，不仅对敌情判断正确，而且部署周密，决心适时恰当，确也表现了他的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他所采取的“分进合击”之术，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练兵御倭

（戚继光）

在抗倭战争中，出生将门的戚继光（公元 1528—1587 年）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调任浙江都司佾书。翌年七月，升任参将，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军务。他痛感明军的腐败，上书请求练兵。他提议选择骁壮之士三千“时加操备 居常教练”以备调用 创营垒之法，使军队“退则后有可恃以更番，进则对垒可恃以无虞”。

因为明军多为市井之徒，有利则进，无利则退，狡猾成性，旧习难改，不堪训练。戚继光在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建议重新募兵，加以训练。他在取得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同意后，在义乌、永康等地很快招募了四千多具有爱国思想的矿工和农民。对这些新兵，戚继光进行了新的编组。最基层单位称队，每队十二人；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每总约八百人，总设把总，官设哨官，哨设哨长，队设队长。

戚继光对新组建的军队，严格地进行了如下教育和训练：一是养兵保民教育。他认为军队本来就是为了“保障

生民，捍御地方”。他常用“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的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的话激发士兵们抗倭立功的热情。二是武艺训练。戚继光教育士兵要学习合于实战的真武艺，不要“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他规定了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让士兵反复演练。三是教练阵法。戚继光根据江浙的地理环境和倭寇侵扰的特点，创制了仅由十二人组成的鸳鸯阵和由鸳鸯阵两等分所构成的两仪阵或小三才阵，以及由鸳鸯阵展开成横队的三才阵。这些战斗队形的最大优点是长短兵器迭用，攻防结合，并易于变化，既便于消灭敌人，又利于保存自己，还有利于在江浙地区作战时运用。四是严格纪律训练。他严禁砍伐树木，毁坏土地，烧毁房屋，奸淫掳掠，杀害战俘。要求做到赏罚严明，当赏者虽仇亦赏，该罚者虽亲不免。他还以当时的通俗文字将各种号令刊出、教授，做到人人能记诵。还要求军官“件件苦处要身当先”，与士兵“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务使‘兵民相体’”“万众一心”。

【点评】戚继光所训练的这四千兵，在后来的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戚继光是明代的抗倭名将，他的训练思想既是对我国优秀军事思想遗产的继承，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我国军事学术的丰富和发展。他的学术思想和训练思想体现在他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军事著作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并结合现代实际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发扬光大。